

福利政策規劃中的價值抉擇

◎ 萬育維

輔仁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壹、前言

社會福利著名學者勃恩斯 (Eveline Burns) 在她所著的「社會安全和公共政策」一書 (Social Security and Public Policy, 1956) 中，對於福利政策的制定是如何受到價值抉擇的影響，有一段精彩的說明：「……即使社會科學的發展能走向更精確、計量的或是所謂理性的方法，幫助政策規劃者解決各種替代性方案抉擇 (Alternative Choice) 上的問題，政策制定者仍是會面對許多相抵觸的價值觀和不相容的目標，在兩難的情況下做選擇。例如，如何在社會保險體系中平衡適切 (Adequacy) 和公平 (Equity)？如何在家庭義務和社區責任之間賦予家庭政策定位……等。雖然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很難避免上述的掙扎，但是價值抉擇內所隱含的政策意義 (Policy implication) 必須有全然的了解，使得任何一個福利政策都是在多面向的嚴謹考慮下的產物……」。勃恩斯這段話點出了福利政策基本上是價值抉擇的過程，所面臨的兩難不是任何計量方法能解決。其實，不僅是勃恩斯，後期如瑞恩 (Martin Rein)、季伯特和斯派赫特 (Gilbert and Specht) 以及笛尼透 (Dinitto)……等人都從價值抉擇 (Dimension of Value Choice) 的角度去分析福利政策的形成和規劃。政策規劃的模式已有許多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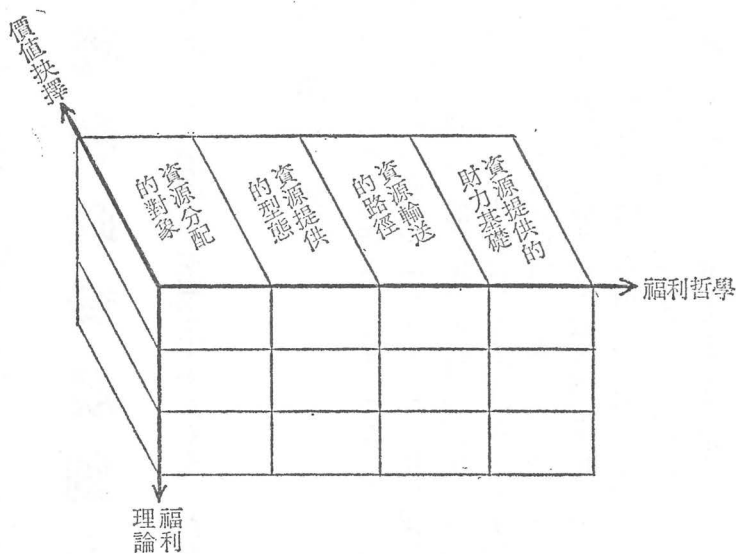
究公共政策的學者歸納出幾個較著名的理論，如理性模式、協商模式、漸進模式……等，國內福利學者也曾以理性模式、漸進模式論及我國的福利政策 (滕青芬、丘昌泰)，但是鮮少有人以價值抉擇的架構分析政策規劃，本文試圖以此觀點，探討福利政策規劃過程中思考的四項重要議題：

1. 社會資源配置 (allocation) 對象的選取。
2. 社會資源給付的形式 (form)
3. 社會資源輸送的策略，以及
4. 提供社會資源的財力基礎。

貳、價值抉擇與四議題之間的關連性

上述四個議題綜合來看也就是：誰應該得到什麼社會資源？經由誰來提供？(Who gets what and how)。因此學者稱福利政策是發揮市場結構之外的另一個資源配置的機能 (benefit-allocation mechanism)。要想回答上述的任何一個議題都受到福利哲學、社會基本價值觀與其他替代性方案的影響，例如，這項福利資源給予對象是應該以婚姻地位、年齡居住地區年限、收入、服務的年限、健康狀況中那一項為標準？給予什麼樣的資源？是實物還是現金？輸送的體系是經由地方政府至社區到家庭還是由中央統籌？

至於提供資源的財力是應該以民間財力為主？政府歲入支持還是以預付方式（contributory）的基金為主？這些議題都是與福利哲學中的正義、平等、公平……等爭論不休的價值判斷有關。如何安排這些價值抉擇的優先順序，或尋求這些基本價值的最佳搭配，是福利政策規劃中最受人注目的焦點。下列的三度空間圖，正說明了福利哲理、價值抉擇和其他替代的可能性，與四個福利政策議題之間的關係。



談到福利政策中的價值抉擇，許多大師都認為三種價值抉擇一直深遠地、看得見或隱含地、直接與間接影響福利政策的制定，而且這三種價值是相抵觸的，那就是平等（equality）、公平（equity）與適切。（Myrdal, 1968; Titmuss and Abel-Smith, 1987; Barry, 1990; Rom and Peterson, 1990），現就分別以這三個價值抉擇角度分析四個福利政策議題。

一、平等、公平與適切性在福利政策中的意義

1. 平等：同等的對待

雖然平等通常被視為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重要標準，但是對於平等概念的解釋至今仍有許多爭議。如果正本清源的溯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界定，分為數字上的平等（numerical equality）與比例上的平等（proportional equality），前者指的就是一般所謂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也就是每一個人同等的對待（same treatment），平等的分享（equal share）；至於比例平等就是所謂的功績主義（meritarian），類似處境的人給予同等的對待，所謂類似處境是以貢獻、功績、價值為依據。仔細分析，上述對於平等的解釋與分配的正義有相矛盾之處，尤其是那些身處不同處境的人的對待方式。學者瓦斯托絲（Valstos）特別提出不平等的正義（justice of inequality）一詞，用來詮釋不同處境的人的平等對待（equal treatment of dissimilar person），是為達到分配正義中最少者得到最多的原則（The least gets most）。福利政策受到平等價值觀的影響表現在定額雇用（quota hiring）的工作機會平等，是個明顯的例子，也就是處境不同的人（殘障與非殘障）應該給予同等的工作機會；另外的例子是美國的聯邦政府對於財力狀況不同的州統一標準的補助款項，以求平等分配州際間的差距。這種區域再分配的做法是為達到平等概念

中同等的分享。

2. 公平：公平的對待

部分學者爲了區分數字上的平等與比例上的平等，將比例上的平等定義成公平，也就是根據個人所付出的努力，貢獻給予應得的獎賞。這種定義表明一個清楚的概念：個人應得多少（deserve）是依據對社會貢獻多少來決定，至於那些不是因爲個人原因而無法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可以給予特別的補足，重點是「非個人原因」。福利政策中對於某類特別羣體如退役軍人、殘障人士的偏好對待（preferential treatment）說明了福利政策對於值得給予特別補助（The deserving）是相當受到肯定的，雖然不符合公平的價值體系。但是在公共救助體系中對於所謂有工作能力不值得救助者（able-bodied undeserving），却又強調公平原則，儘量使公共救助的生活補助金額不超過低收入者的勞工階級，以維護工作誘因。這種生活補助金「不超過低收入的工作者（the working poor）」的做法早在一八三四年英國濟貧法中以「次於劣等（less eligibility）」的規定記載得非常清楚，也就是：接受公共救助而且具有工作能力的窮人的生活，不得比在勞動市場中工作的低所得的工人來得好。這個概念直到現在仍然廣泛的被接受。因此從上述的角度來看公平的補助是用來維持工作誘因。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美國困苦失依兒童家庭補助方案（AFDC），於一九八三年開始給予接受救助的單親母親額外的居家照顧兒童津貼，因爲改革委員會認爲母親（motherhood）也是一項有貢獻的職業，按照公平的原則也應給予酬勞。當然這項改革引起一般職業婦女的不滿是可以預料到的。

3. 適切性：適當的生活水準

除了上述平等和公平的價值抉擇之外，適切性是較少學者論及的一個概念，強調的是維持身、心健康生活的標準，佛蘭肯納（

Frankena, 1962）曾論及：在追求分配正義當中，「適當的」生活這個概念常被忽略。適當的生活是對人的尊嚴的尊重，追求的不是極端的平等，而是本質上、基本上和精神上的平等。適當的標準隨着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異。十年前維持生活所需的工資（living wage）和現在的生活工資不能相提並論，當然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的生活適當標準也會不同。適當性這個概念表現在福利政策中就是公共救助體系在生活費用計算方式（也就是貧窮線）的爭議。不論從維生的觀點，或是食衣住行育樂、醫療……等消費習慣的觀點來界定適當的生活所需，都反映出一個重點：福利政策對適當性的考量，希望能以估計的方式計算出適當的生活水準所需的費用，對那些低於適當生活水準的人補足其差額以維護人民本質上的平等。但是在實際的公共救助體系中，對於公平的強調遠超過對適切和平等的着重，因爲在資本主義取向的社會中，仍是以「努力工作才值得獲得獎賞」的精神爲許多政策的主幹。相較之下，理論上而言社會主義取向的社會是以平等價值抉擇爲依歸。

由上述的分析明顯看出原本福利政策的規劃是爲了達到分配的正義，以實踐公平、平等與適切的價值標準，但是往往在抉擇這些相互抵觸價值原則時，會受到意識型態、有限資源與其他大環境的影響，現就給付對象、資源型式、輸送方式和財力來源四大議題分析不同的價值抉擇。

二、福利政策四大議題的價值抉擇取向

基本上福利政策最關切的四大議題，必須在下圖的兩個價值取向間做一抉擇。

上述的架構是以個人取向（個人對福利的追求）和集體努力（經由政府運作）取向做爲兩個定點，分析福利政策中對於給付對象、資源型式、輸送方式和財力來源的決定。馬歇爾（Marshall，

個人主義取向	福利政策 四大議題	集體主義取向
給最需要的人：以符合最大效用原則	1 給付對象	所有的人都應該享有福利資源：以符合平等對待原則
現金補助為主：以符合個人偏好的選擇自由	2 資源型式	實物給付為主：希望達到間接的社會控制
由各區域自行決定：以符合差異性的自由 (freedom of dissent)	3 資源輸送	中央統籌、規劃和執行：以符合效率和標準作業
地方自籌：以符合福利事業共同參與原則	4 財力來源	中央提供：以符合福利國家強調的聯邦責任

1965) 也曾將個人追尋福利和福利國家集體努力做了解釋，他認為個人對福利的追尋是一種自然權利 (natural right) 是不可侵犯的，但是福利國家的責任是保障整體 (whole community) 的福祉，這種福祉並非是個人福祉的總和。個人的要求 (claim) 必須受到規範和限制才能在整體福祉中找到個人權利和大眾的好 (common good) 之平衡點。

1 就資源給付對象而言

給付對象選取上的兩個定點是：給那些最需要的人還是大家都可享有的普遍原則。在季伯特和斯派赫特的書中將前者定義為成本效果 (cost effectiveness)，也就是將有限資源做最大效用的發揮，將每一分資源分配給那些無法在市場競爭中得到他們應得的。

根據這個原則，就必須制定一些區隔和選取的標準以幫助「選出」那些真正需要的人 (the truly need)，例如，依賴人口、沒有工作能力的人……等。至於另一種是以平等對待為主的普遍性原則，季氏和斯氏稱為社會效果 (social effectiveness)，只要是社會中的一員，應該給予平等的對待，不應該將有特殊需要的成員在行政手續的申請過程中給予不平等的對待，例如烙印的屈辱過程……等。笛特姆斯 (Tiltnuss) 針對成本效果和社會效果做進一步解釋，他認為短期來看成本效果原則較符合資源有效運用，但是在選取過程中的行政時間成本如果一併計算未必是真正的最大效用。再加上因為申請過程的複雜和資格選取上的限制，阻礙了有需要的人前來申請，造成的間接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上的不當，也是應該一併考慮。

2 就資源的型式而言

政策在規劃福利項目時常徘徊在現金 (Cash) 與實物 (In-kind) 給付的價值抉擇。現金給付的優點在於案主可以作充分的使用配置發揮消費者主權 (Consumer Sovereignty) 的選擇自由；但其缺點則為無法確保受惠者正當的使用，以及在市場經濟體系下，能否購買到所需要的項目，也是要考虑的重點。若使用者作不正當的使用，無法達到原先的目標，更產生負面的影響。實物給付，如提供食物、醫療或器材、配給住宅、心理諮商與治療……等措施，固然可以確保服務的使用，却忽略了案主個別的需求，限制了選擇的自由，同時由於其轉換性甚低，使用者亦不可能自行調整。雖然使用者可以自行決定要或不要，但是福利項目往往將現金給付配合實物給付做為行為或態度改變的一種社會控制的方法。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的 AFDC 案中接受補助金的父親或母親也必須同時接受職業訓練或就業輔導或諮商服務，以「矯治」或控制他們的觀念與

行爲。

3. 就資源輸送方式而言

如何將福利資源服務到、運送到需要的人身上有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其一是所謂的科層輸送帶 (bureaucratic lines)，另一是民主社會中強調的多樣性的不同的自由 (freedom of dissent)，前者是循着中央、地方、鄉鎮由上到下的組織結構，後者是由需要者或當地居民參與籌劃設計的輸送方式。學者布勞 (Blau: 1956) 曾對「民主與科層輸送帶」之間的抉擇進行解釋，他認為這種抉擇與「相異的自由」和「效率」之間的抉擇有類似之處。當居民代表不同的利益團體聚集在一起，決定社區事務時，最大的問題是花費了許多時間協調衝突的意見，最後不一定會有結果。雖然不同的意見都滿足了表達的自由，但是在規劃的效率上而言就比不上科層體系中的交辦事項。再以 AFDC 為例，是典型的科層輸送帶取向，使用者常抱怨「雙重作業」：目標訂定是一種說詞，真正運行出來的服務項目又是另一回事。反觀六〇年代貧窮作戰計畫中的對於低收入社區推行的示範性城市方案 (Model Cities Program) 是企圖結合科層和社區民主、參與的模式，但是根據評估結果發現，最大的問題在方案真正目的：「居民參與和規劃」，沒有被意識到，當然也沒有達到。(Kramer, 1969)

4. 就財力來源而言

中央與地方在福利政策預算規劃上的分擔 (Cost-sharing) 一直是爭論的議題。這種爭論尤其存在中央補助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務委託民間部門的三層關係上。例如中央對於申請統籌補助款 (Block-grant) 的地方政府應有多少介入？是需要詳細的規定申請資格、服務人次、服務項目？還是給予地方政府補助款之後，完全授權地方政府全權處理 (稱為地方自由裁量：local discretion)？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表現在：

- (1) 經濟補助的額度與
- (2) 申請資格的限制。

美國目前統籌補助款的作法是由原先零星的十九個類別補助款 (Categorical-grant) 演變而來，中央政府對統籌補助款的運用只概括的規定了健康、福利、教育、法律和社區發展五個大項，細節部分全交由地方政府處理，如此一來也可減少中央科層 (Washington Bureaucracy) 的負擔。這種授權地方自主的作風，在雷根政府的時候最明顯，稱為新聯邦主義 (New Federalism)，聯邦政府逐漸放棄全國性福利政策規劃和主導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地方政府在福利方面扮演較過去更積極、主要的角色，不論是在經費或政策規劃上。

在上述的分析中，對福利政策規劃過程可能面臨的價值選擇做了介紹，接下來舉美國老人退休保險的例子說明政策制定之初與修正過程中的價值抉擇，以提供我國在規劃相關政策時的參考。

參、美國老人退休保險 (Old Age Insurance) 修正過程中的價值抉擇

老年退休給付是美國老年人退休之後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Schulz, 1988)，老年退休給付是根據一九三五年通過的社會安全法案當中的老年退休法案為基礎，在三十七年當中前後經歷了二十多次重要的修正和改革，法案制定之初期待以公平、合理和適切為目標，確保家庭收入不因退休……等因素而中斷，這種經濟保障的理想是福利國家所追求的，但是在修正過程中，常常遭遇到「福利」和「資本主義中的公平競爭、追求卓越」的衝突。這種衝突完全說明了福利理念強調的適當性和保險體系中強調的公平性之間的矛盾

。承如前文所述，適當性是保障人民適當的生活水準，而公平性是強調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美國精神。當這兩個價值觀放在退休保險政策同時考慮時，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尤其是反映在原本所得就不多的中低收入者。以公平原則分析，他們的「工作績效」或「工作季點」不如高收入者顯著，因此他們每個月領取的退休給付（retired payment）當然有差異，但是為了維持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準，一九八二年以前，一直有所謂的最低保險給付（minimum payment）的規定，給予那些薪資所得本來就不足者，較多的退休給付，以維持一定的、適當的生活水準。同理，對於那些高收入者也有最高給付的規定（maximum payment）。由此看來，當時退休給付的重點是以適當性為主。但是八十年代以後，為了減輕財政支出上龐大的赤字，取消了最低給付的規定，將適當性的重點移轉到公平性，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強調的「各取所值」、「你拿你應得的部分」，所謂的應得就是原先被保險人繳納的多少而定，保險繳得多的人（也就是高收入者）將來退休後領的退休給付當然多於那些保費繳的少的人。於是學者（Schulz, 1988, Achenbaum, 1986）批評退休保險是貧富差距、財富分配不均的社會型態的縮影，但是這或許也是美國競爭社會下的公平原則。也因此有所謂「年金精英」（pension elite）的出現，這些人不僅參加強迫性的老人退休保險體系，更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收入再加入其他的私人退休年金。當這些年金精英退休之後，他們不僅從社會安全法案中領取退休給付獲得保障，更因他們原本比別人優厚的薪水，或特別的職業類別（如律師、醫生、教授……等），加入私人保險的年金計畫，而得到多重保障。相對地來看，那些原本薪資就差人一等的中低收入者，購買私人年金保險的能力也少，日後得到的保障也少。

八十年代以後，政府為了縮減福利支出的諸多做法當中，有一項是鼓勵民間、私人企業接辦部分福利事業，老人退休保險是政府期待逐步私有化的目標之一，令人憂慮的是即使政府鼓勵私人保險公司開辦各種「誘人」的年金計畫，以福利市場私有化取向的做法，協助政府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充其量只是保障了冰山一隅的部分老年人口。以白宮老人經濟安全委員會（Income Committee for the Aged）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顯示下列的事實：

在即將退休的人口中（五十五歲至六十五歲）

- (1) 將近六五%的人沒有加入私人保險的退休年金計畫；
- (2) 在這些人當中，六四%是男性，三六%是女性；
- (3) 在這些人當中，有七五%是在私人機關做事，而這些私人機關的規模有七九%是少於一百名員工的中小企業；

(4) 這些人的經濟狀況如下：

三六%的人年薪所得少於五、五〇〇元
三〇%的人年薪所得介於五、五〇〇元～一五、〇〇〇元
一九%的人年薪所得介於一五、〇〇〇元～二〇、〇〇〇元
一五%的人年薪所得在二〇、〇〇〇元以上

可見私人保險事業的發達未必能保障所有老年人的經濟安全，上述令學者擔心的議題，經實徵研究（Schulz, 1988）確定為事實。近年來，政府以「鼓勵民間參與福利事業」的「福利服務私有化」策略，運用在老年人經濟保障上是否妥當值得深思。

個人退休給付的每月金額，不僅受到原來所得的多少、累積季數的長久影響外，還受到退休年齡（retirement age）的左右。一般而言，個人可以提早在六十二歲退休，仍有社會安全下的完全保險，但是退休給付將永遠是一個打了折扣的金額（八成或七成）。同理，如果延緩退休年齡，領取退休給付將是正常退休年齡的一〇

三、一〇五%之間。減少或增加的給付金額是依據個人未達或超過六十五歲而領取給付時所提前與延緩的月份數計算。

註* Based on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Pension Policy: Coming of Age: Toward a National Retirement Income Policy Report of the Income Security Committee for the Aged. (Washington D.C: The Committee, 1990) pp. 251 ~ 258.

現就分析影響每月給付金額的兩種情形：提前退休(early retirement)與延緩退休(delay retirement)，雖然這種「因為延

減額年金占正常退休給付金額之比率

申請退休年齡	正常退休年齡 (Normal Retirement Age)		
	65	66	67
66	103.50	100.00	93.33
65	100.00	93.33	86.67
64	93.33	86.67	80.00
63	86.67	80.00	75.00
62	80.00	75.00	70.00

每延後一年退休，其退休年金增加的比率

出生年月日	增加比率
2 January 1925 to 1 January 1927	3.5
2 January 1927 to 1 January 1929	4.0
2 January 1929 to 1 January 1931	4.5
2 January 1931 to 1 January 1933	5.0
2 January 1933 to 1 January 1935	5.5
2 January 1935 to 1 January 1937	6.0
2 January 1937 to 1 January 1939	6.5
2 January 1939 to 1 January 1941	7.0
2 January 1941 to 1 January 1943	7.5
2 January 1943 or later	8.0

緩而增加給付金額，提前而減少給付」的規定符合保險理論公平的原則，但是同時也違反了社會保險應有的適當性。

1 提前退休：在美國，不論男女，正常退休年齡為六十五歲。受雇者年滿六十二歲時，若合於前文所述的給付資格，即合於申請減額年金給付(reduced benefits)之條件。其減額給付標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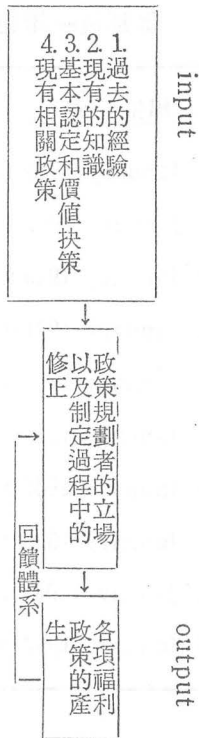
2 延後退休：領取退休年金之年齡可延長至年滿七十歲為止。自一九八二年開始，每延長一年退休，則其退休年金給付將增加百分之三。但自一九八九年起，受雇勞工延後退休時，其年金給付增加之比率已改如下表：

對於提早退休者的退休給付的扣除比率，與延緩退休者的退休給付的加重比率的做法是否合理？增減的比例是否適當？學者們提出許多不同意見，但是若從提早退休的原因分析，令人覺得這種規定的確有再斟酌的必要。根據國家老人諮詢委員會一九八七年的研究報告發現，有五七％提早退休的人是因為健康狀況不好，對於這些需要額外醫藥花費的人，又再給予只有原應得退休給付金額的八〇％左右的退休年金，似乎與原先退休金法案的宗旨：「保障老年人經濟安全」，有違背之處。同理，在延後退休的老年人當中，有二％是因為特殊專長技能繼續留任原公司任職或聘為顧問。這些人原本是學有專精的高級人才，經濟保障上較中、低收入為佳，按照規定又再給予他們延緩退休的特別加權，令人擔心政府辦理老人退休保險的理念：「保障老年人家庭收入不因退休、疾病……等非個人因素導致恐懼和匱乏」，在過度強調公平的修正原則下喪失原先的宗旨。

肆、結 論

由上述分析可知，福利政策制定的困難與複雜性不同於一般其他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價值抉擇往往左右了政策的走向，而所面臨的兩難不是理性決策模式，或是常用於公共政策中的模擬（simulation）分析可以解決。因此不論是學者皮爾斯（Pierce, Dean）所著政策與社會工作實務（Policy for the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 1984）、瑞因（Rein, Martin）所著的從政策到實務（From Policy to Practice, 1983）或是雷莫爾（Reamer），都將價值抉擇視為是福利政策制定過程中諸多輸入變數（Policy Input）中重要的一項。如下圖，以系統分析的角度說明相關變項如何影響福利政策

影響政策制定的因素



當然，政策制定過程中除了規劃者（通常是以委員會的方式運作）的價值抉擇外，立法體系、行政體系以及壓力團體（如美國的遊說團：lobbyist）都會以制度化或非制度化、間接或直接的方式影響福利政策的制定，這是在一個多溝通管道的開放社會中必然的事，雖然在時效上不盡理想，但在意見的表達上有其功用。

前文，探討了四種價值抉擇，如何影響福利政策中四個議題：應該將福利資源按照什麼標準分配給羣體？給他們什麼型式的福利資源？透過什麼樣的輸送路徑給予福利資源？財力籌措如何分擔。同時，前文也述及美國福利政策從制定到修正過程中，如何徘徊在價值抉擇的兩個向度之間。承如本文一開始引用勃恩斯的一段話：「……無論社會科學如何進步、福利政策制定過程一定會面臨到公平、平等、適當……等價值抉擇的困擾」。似乎這個困擾會在福利政策領域持續着一個無解的困境。本文的目的並不企圖提出解決的策略，重點是使讀者明瞭福利政策制定過程中所牽涉到的決策不是用成本效益評估等計量方式可以得到解答，也不是理性模式中所謂，「……在許多代替性方案中做一個理性的判斷……」。她往往是受到規劃者、立法者和相關介入力量價值抉擇的影響。最後，借由吉沃斯（Gewirth）對於價值抉擇的正當性（justification）提出的原則，做為福利政策制定過程中思考的方向。

1. 政府對於個人基本生活需求如食、衣、住、醫療保健的保障

，優於對於其他人自由權(right to freedom)的保障。

2 而一個人的自由權優於他自己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個人有權決定要不要申請福利服務，要不要接受救助或服務。當然，如果該決定違反了他人基本需求或是危害他人身心，是以上述第一條原則為準。

3 政府在維護與保障某一羣體的基本人權，如基本生活需求，免於受到傷害、接受教育和社會救助……等方面的順位，優於他人財產的保留。例如政府有向人民要求納稅的權利，透過再分配的機能，保障特殊羣體的基本需求。

既然價值抉擇的困境無法在福利政策制定過程中完全避免，至少可以做到正當性的抉擇(justified choice)，使得福利政策的任何一項決定，都是為了達到分配的正義所做的謹慎考慮。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1. 滕青芬譯(一九八六)，社會政策制定的過程，社會建設季刊第五十八期，頁一一—一四。
2. 丘昌泰(民七十四年)，我國社會福利預算合法化過程之研究(民國六十四至七十二年)，社區發展季刊第三十一期，頁五四—六四。
3. 陳小紅(一九八九)，一九八〇年代美國社會福利政策的改革方向與啓示，經社法制論叢第四期，頁一一—一七。
4. 黃正源(一九八九)，從政策分析觀點析論美國社會安全制度的演進過程，社區發展季刊第四十五期，頁四一—四八。
5. 萬育維(一九九二)，社會救助與福利國家之間的衝突——從低收入戶的界定、福利與評估談起。(未發表)

6. 林水波、張世賢(民七十九)，公共政策，五南書局，頁一一—一四。

7. 張煜輝(一九九〇)，社會政策的形成過程，社區發展季刊第五十一期，頁一〇二—一〇六。

英文部分

1. Gilbert, Neil and Harry Specht (1986). Dimension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NJ: Prentice-Hall, pp. 37-61.
2. Burns, Eveline (1956). Social Security and Public Policy. NY: Mc Graw-Hill. pp. 107-116.
3. Titmuss, Richard (1987). Equity, Adequacy and Innov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in Brian Abel-Smith and Kay Titmuss (ed.) The philosophy of Welfare UK: Allen & Unwin. pp. 220-231.
4. Barry, Norman (1990). Welfare,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5. Rein, Martin (1970). Social Policy. NY: Random House. (1983). From Policy to Practice. NY: Sharpe, Inc. pp. 96-112.
7. Kramer, Ralph (1969). Participation of the poor. NJ: Prentice-Hall.
8. Schulz, James (1988). The Economics of Aging. (4th ed.) MA: Auburn House Publishing Company.
9. Myrdal, Gunnar (1958). Values in Social Theory, in Social Theory, in Paul. pp. 254-258.
10. Pierce, Dean (1984). Policy for the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 NY: Loughman, pp. 61-80.
11. Reamer, Frederic (1990). Ethical Dilemmas in Social Service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